



中国文化现代化索解之一

Lixing de xiandaihua
Lixing de xiandaihua
Lixing de xiandaihua

王志亭 著

理性的现代化

山东人民出版社



L'industrie Lorraine et la Société des
Établissements Léonard de Vinci

LEONARD DE VINCI

理性與現代化

André Gide



中国文化现代化索解之一

Lixingde xiandaihua
Lixingde xiandaihua
Lixingde xiandaihua

王志亭 著

理性的现代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现代化索解 / 王志亭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 7-209-04118-4

I. 中... II. 王... III. 文化哲学—研究—中国
IV. 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8230 号

责任编辑：景洪兴

封面设计：周云龙

中国文化现代化索解之一——理性的现代化

王志亭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 (155mm×230mm)

印 张 19.5

字 数 24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

ISBN 7-209-04118-4

定 价 (共四册)8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532)88194567

辩证理性的当代形态，近代以来
人类基础理性的重新审视，中国辩证理
性的升级文本。



中国文化现代化索解

◎理性的现代化

动静论

现代心物论与现代历史观

现代民族格律与现代民族格律诗

责任编辑 景洪兴
封面设计 周云龙

丛书序言

打从二十岁独立思考算起，求索四十余年，追根探源，难以止步，以至“不知老之将至”，六十有六，尚无一字正式刊布。虽有哲圣“大器晚成”之训可供解嘲，且“能耐寂寞”也足可以阿 Q一番，愚钝之态毕竟难以遮掩。……反正结果是，作者成了一个尚未出土却又将近入土的“宝贝”。

20世纪初，鲁迅先生说，中国的新文明，要“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至今读来，怦然心动，嘴上不敢说，心中暗忖：英雄所见略同矣。

回顾来路，苦心孤诣所向往的，大都与这“略同”相关，所以论域迥异的几本小书，居然都可以归入“中国文化现代化索解”的名目下。

所谓“索解”，即“求答”，即“立”，即“建设”。它不搞“指手画脚”（“指导”别人做，自己不做），也不搞“圣人遗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索解”孜孜矻矻于“内”与“外”的现代沟通，综合创新，且须拿出具体方案、具体模型、具体处方，并可以证实或证伪。自然，这种书，既难写，也难出，而且风险是最大的。求仁得仁，又何怨？

人生有限，难以预测。今借事情本来的段落性，权将“索解”四种集成一丛，先敬轩辕，后献国人。一来至少可以部分地“搪塞”匹夫之责，二来还来得及听取批评，以便改进。

索解之一为《理性的现代化》，可归于哲学类，但文本很“另类”。具体内容包括辩证数学、辩证哲学（辩证法）和辩证逻辑，三者依次衔接，构成作者心中之辩证理性的当代形态。——以辩证理性耦合形上理性，尝试双重理性的同步刷新，是其显著特点。本书可以说是对近代以来人类基础理性的一次重新审视，且窃以为也是中国古典辩证理性的

一种升级文本。

索解之二为《动静论》，是辩证数学的物理学应用，提出以中国古代自然观（动静观）的现代化整合现代理论物理学的一种可能；是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一次对接，一次互相作用。大家熟悉的物理模型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并因此而进一步靠近了物理学的“大统一”（实际上只能是动静对立统一）。

索解之三为《现代心物论与现代历史观》，它在数理背景上按现代辩证原理言说人的生存及其历史。由于以反思近代以来西方辩证法和逻辑原理为基础，理论在深度上有所进步，在境界上有点中国化。远而言之，可以说是司马迁历史观的继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天是物，人有心；天人者，物心也。（在中国古代，“天”无论怎样“神学化”，总是客观物质世界的“神学化”，或者说是“神学化”的客观物质世界，总是人的对立面，因而“天人”总是主客矛盾的一种反映。）

以上三解，可能在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个领域为中国理性文化打了一场“翻身仗”。——自然，这是狂妄之时心里想的，说出来，就有违“谦谦君子”之道了，而且自己也是捏着一把汗的。

索解之四为《现代民族格律与现代民族格律诗》，考察汉语诗歌形式与汉语的内在联系，探索汉语诗律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并据以前瞻，提出汉语诗歌“现代民族格律”草案。本书还包括一个“现代民族格律诗”试验作品集《女娲》，以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此解，对民族诗歌艺术的发展可能不无裨益。

上述“索解”，涉及数学、哲学、逻辑、物理、心物学（人学）、社会历史

学、语言学和诗歌艺术若干方面。虽然内容“五花八门”，但努力的大方向却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且大都与世界化也是一致的)；夸张一点说，也就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丛书各册均有自己的卷前语，可供了解更多具体情况。希望读者能够从它们那里得到探险的乐趣，以及不同味道的思考的交流。

我们愿与读者一同探寻中华民族久远的灵魂，重铸中国人的理性脊梁，建造中国文化与世界平等对话的现代平台。

林廷生先生评价山东人说：优点是实在，缺点是太实在。妙哉！至少我这个山东人，至少作文，还真跳不出这道藩篱。不管是非直曲狂狷中庸文质雅俗贵贱荣辱，暂且就这样了。“原本精卫衔沙事，迷入浩茫问津者”，难道还羞于别人指点吗？

王志亭

2006年10月初

一阴一阳之谓道。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易经·系辞上》

卷 前 语

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是一种数学新创——辩证数学和它的两个应用:有关哲学(辩证法)和逻辑学方面的应用。——总体精神,为书名所概括,丛书序言相关部分也略有交待。辩证数学是一种极其简易的带有中国风格的“本土数学”。我们希望它能给中国本土学术(本位文化)的未来命运带来一点消息。

黑格尔说:“哲学不能由一门从属的科学——数学——取得自己的方法。”马克思则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胡塞尔在《逻辑研究》里坚持:“数学的探讨形式是唯一科学的形式,只有它才能提供系统的封闭性和完整性,只有它才能为所有可能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的形式提供一个概观。”罗素在他的《数理哲学导论》里又写道:近代以来“逻辑更数学化,数学更逻辑化,结果在二者之间完全不能划出一条界限……”还有人断言:“我们相信,即使放荡得出名的形而上学也能被逻辑和数学所控制;即使纷乱得出名的哲学史,也能从某些经典观念的精确重建而得益。”(Mario Bunge)更有如下言说者:“没有数学,我们无法看穿哲学的深度;没有哲学,人们也无法看穿数学的深度;而若没有这二者,人们就什么也看不透。”(Bordas Demallins)谁说得对呢?我想,至少可以肯定,黑格尔老人落伍了。

数学、哲学和科学密切相关,其实是一个普遍规律。

就西方而言:古代希腊先哲多是数学家和科学家,一身多任;近代、

现代欧美哲学家也多有数学家、逻辑学家、科学家、心理学家等，互相交叉。数理逻辑的奠基人弗雷格，就直截了当地说过：“一个好的数学家，至少是半个哲学家；一个好的哲学家，至少是半个数学家。”

古代中国，就微观而言：易卦系统是一个哲学系统，也是一个数学系统。易学自古伴像数之学：“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系辞上》）。后人更看出，易卦符号系统蕴涵非十进位制数，卦符分类涉及组合数学，卦变图与贾宪三角相关，揲蓍占筮术则为中国古代剩余问题之滥觞。中医学与阴阳学说的密切关系，则提供了一个科学与哲学互相提携的古典范例。就宏观而言，先秦诸子争鸣的时代，既是中国哲学大发展的时代（易、老、孔、墨、名、庄、孟、荀等），也是中国科技和中国数学大发展的时代（《周髀算经》、《考工记》、《山海经》、《甘石星经》、《孙子兵法》、《黄帝内经》、《九章算术》等）。

宋是传统哲学的又一高峰期（象数学、义理学、心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科技和传统数学的历史之巅（如火药、指南针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宋元数学四大家）。北宋沈括是科学、数学（创隙积术、会圆术等）、哲学三位一体的突出代表。南宋朱熹则是另一位哲、科、数（象数）大综合的佼佼者。“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胡道静）。李约瑟也有类似的结论，甚至还认为“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数学大家秦九韶（著《数书九章》）实际上也是一位三栖人物。……

反过来看，由明到清，中国的衰落，总体而言也是科学、数学、哲学全面衰落的（明代以下的学术评价，应该放在世界场上来考量）。民国以后，随着留洋学子陆续归来，开始回升（此时可以说“引进”就是回升），也是三者同步回升的。一百年来，中国的科学，数学和哲学，都有了巨大进步。但也毋庸讳言，直到今天，我们的科学，还是以跟踪为主，原创不足；我们的数学，大部分精力花在解答别人的问题上；我们的哲学，有中、西、马之别，其实十有八成是西学，中哲处于最弱地位。总之，科学、数学和哲学三者都处在跟踪西学的历史过程之中，中国的本土新

学术即使在国内也是处于弱势。这是中国必经的阶段,因为我们的的确落后了(前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之差)。

历史事实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示?至少有四,如下列。

启示一:理性是个大系统,其中诸部分,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上述同步或三栖现象,原因何在?——就在于,三者同是人类理性的体现者。可以说,哲学、科学和数学是一组理性三联方程组,求解总是互相牵连的。

启示二:理性的兴衰关乎民族兴衰。哲学、科学和数学同荣则社会进步,同枯则社会退步,这表明引导人类进步的是理性的进步,其他的进步都是以理性进步为主导的,至少止于目前,这是人类百万年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上世纪西方出现了某些反理性(基本是形而上学理性)的声音。切不可一叶障目,这至多促成理性的改进(辩证理性的加强),绝不会减弱理性。特别是中西发展阶段完全不同,更当力戒人云亦云。人过之,吾不及。“未雨绸缪”可,“因噎废食”则不可。一言以蔽之,“理性中国”永远值得我们追求。

启示三:单就数学而言,其发展不仅有助于科学发展,也有助于哲学发展。成中英介绍当代西方哲学如是开篇:“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新发展,又有赖于新数学的产生。因此,要研究这一世纪西方哲学的变局,首先要从数学谈起。”(《论中西哲学精神》)以史为鉴,中国哲学的重新崛起,也当与中国本土数学和中国本土科学的进步大有干系,至少需要这么一种成分。这就是说,要预言新世纪中国哲学的“变局”,也是可以“从数学谈起”的,而且它与科学、哲学的关系,当比以往更为紧密。因为现代文明的理性关联更为直接了。

启示四:创新是最有效的追赶。东方学习西方的历史经验证明,无论哲学、科学、数学,后进若要追赶先进,当然要学习,但若学习没有创新成分,那是永远也追不上的(假设先进也在继续进步)。文化上,我们有中外两种资源,都要强调创新(至少是举一反三)。发展民族文化更要强调民族文化的创造。因此,我们所谓“从数学谈起”,首先指的是中

国自己的数学创造,包括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数学化,中国传统数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中西数学智慧的综合创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数学创新等。总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让东方智慧在现代数学园地有一个充分的表达。所以,在我们关注世界数学进程的同时,也应该关注那些华夏原生态的数学根芽。这些都是东方文明觉醒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不能没有自己的现代化的表达工具。中国古典辩证理性迫切需要升级版本。历史在呼唤数学的“国风”。

这并不是谈玄说虚,其实早就有人行动了。自20世纪初年,李俨、钱宝琮等开启中国古典数学的现代研究,成绩斐然。20世纪70年代始见反本开新之作,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就是例子。吴学谋的“泛系理论”侧重于研究关系,则明显与中国传统哲理有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辟蹊径,探索新数学者也收获颇多。譬如邓聚龙的“灰色数学”,蔡文的“可拓集合”模型,孟凯韬的“哲理数学”等等。另外,也见过关于中医机理、河图洛书、五行八卦等若干数理新解。此类思考,同样也是有益的。自然,上述种种,即使皆为珠玉,仍然不敷应用。历史的进步,需要一个中国数理文化百花齐放的新时代。

历史启迪,对于促成本书以“辩证数学”与大家互动,与有功焉。

辩证数学的努力方向,可藉下面几个“对立统一”作一概览。

——哲理与数理的对立统一。众所周知,辩证法有志于反映自然、社会及思维的普遍规律,其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万物之纲纪)。任何“规律”都得之于人的认识。因此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辩证法的内容与形式也必不断进步。自近代辩证法的开创者黑格尔谢世至今,已近两百个年头,这其间人类认识世界的深广程度,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肩的。多年的实践与思考,使作者认识到:能反映现代认识的现代辩证法的基本文本形式已经非数学莫属了。理由可举如下几条:

(1)数学文本可以摆脱自然语言的含混性,随意性,达到定性定量的对立统一,以使辩证法严密化,系统化。(2)数学的抽象与严谨有助

于哲学从现实世界提取概念,选择概念,组织概念。(3)数学文本可与现代科学实质性地接轨,定量地介入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4)并因此而使辩证哲学的双脚站在现代文明之中,从中获得自我发展的新的动力和智慧。(5)数学文本有助于廓清形上形下、中哲西哲、哲学科学、方法论、认识论、逻辑、辩证法、辩证逻辑、形而上学、形式逻辑、数理逻辑等等问题之间细致的构造性的关系。(6)有助于寻找辩证逻辑连接计算机系统的接口。(7)有助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流,有助于科技与人文的沟通。(8)解读数学文本可以得到自然语言文本,前者包含后者,——这正符合进化的一般规律。

总之,把推动辩证法现代化的任务书交给数学是符合时代需要的。但是并无一种现成的数学可以接受这个任务。这也便是辩证数学之缘起,并且导致了辩证理性与数学理性的互通互诠。

——形上与形下(道与器)的对立统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这表明,十九世纪,哲学就已经十分抽象了。现在,由于数学化,哲学实现了再一次的抽象,——自然观及社会学问题(唯心唯物问题)分离出去了,思维规律问题(包括逻辑学)也分离出去了,只剩下量纲任意化了的纯粹的辩证关系,终于名副其实地可以被看作关于“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正因为如此,具有了最广泛的应用。而具体应用,又是“形上”的“形下”化。于是,数学化的哲学,虽然按抽象程度成了唯一的“道学”,其他均归于不同层次的“器学(科学)”,但哲学没有因此而陷于高处不胜寒的孤单。“道”与“器”的互相转化,结果是“本质论”与“工具论”的合二为一。

——东方与西方的对立统一。这里的东方、西方指双方在认识、思维、方法、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特点。辩证数学致力于寻找东西文化的共同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以求双方的自然融合。譬如中国形上的重视定性(善诊者先别阴阳)与希腊形上的重视定量(数是万物的灵魂)

的交融;中国数学的公式化传统(参看本书附录)与希腊数学的公理化传统的汇合;中国的善于对偶之道(阴阳论)与希腊的致力于单子的学问(原子论)的兼采;中国辩证法的结构(建设)精神与西方辩证法的解构(否定)精神的协作;东方的强于综合思维的传统与西方的强于分析思维的传统的融通;等。

其中综合与分析的对立统一,本质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走向和解。这并非强求,不过是把本来的连通揭示出来。在辩证数学里,辩证法对应于一个指标集,全集为完全辩证法,非全集为非完全辩证法,后者就包括合理形而上学。因此,辩证数学不仅不排斥任何分析性(离散性)的研究,反而视它们为辩证法的(综合的)基础。——没有分析的综合是肤浅的综合,没有综合的分析是零散的分析。两者结合,相得益彰。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西方“学术”与辩证数学是或者相容或者相交的。现代西方哲学提出的问题,未必不能在现代辩证哲学里找到解答。

——历史与未来的对立统一。置身于中国的现时代,就难免要顾后瞻前,就肩负一个使命:传承历史,开辟未来。关于此,辩证数学有如下认识,并在实践上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前面谈到中国处于引进西学的必然历史阶段。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本土文化是否可能有一天扭转被动局面,由跟踪变为主导呢?回答这个问题,至少涉及四个方面:(1)中国文化是否拥有这个潜力——须知,并非每个民族都有这笔可供开发的资源;(2)历史是否提供了这种可能;(3)如果潜力和时机都已具备,具体应该从哪里突破;(4)所谓“突破”的标准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而言具有异质性和五千年积累的丰厚性。这是全世界都看得见的。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文化(主要指形上文化)的现代化,如果生搬硬套无疑于自杀。——因为久远的历史,已经使中国形上体系机体化了,她有巨大的消化外国学术的胃袋,只能是消化吸收,发育自己的机体,最终是一个

完整生命的现代化。这方面的历史先例中国是有的，那就是禅宗对于外域佛教的扬弃而自立，进而是理学对于佛学的扬弃而自立。

上述特点，一方面使中国文化的变革困难较大（与器物、制度的变革相比而言），一方面也使它具备对世界有所作为的潜在力量，因为它有其它文化不可通约的先觉而普适的成分。

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西学东渐，从清末算起百年有余，从明末徐光启、利马窦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算起四百年有余。迄今可以说，中国人对于西学的了解至少超过了西方人对于中学的了解。这里还有一个日本可作参照：日本的西学最初经由中国传入，而日本的现代化早已完成。如果中国人今天还认为时间不够，时机不到，那只能说我们自己没有出息。

有了前面的两个肯定，第三个问题，就摆在面前了（就看我们的主观认识和主观努力了）。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文化、经济、政治、教育、科技、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它们各有各的突破战略。这里要说的是文化特别是哲学的突破问题。现在不少人把希望寄托在高扬“和合哲学”、“儒家伦理”等方面。这些肯定都有用。但偏于人文，疏于科技也是显然的。响应西方反理性的人文哲学是必要的，但是不够。我们不能满足于拾遗补缺、也要敢于引领潮流。前面已经谈到，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还是理性为主导，非理性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理性来解决（只有理性能够认识到非理性的价值）。有了理性才可能纲举目张。有了理性再结合“反理性”，这才构成完整的文化，这才有望与世界平等对话（不要忘记，西方现代文明是科学+人文，西方现代哲学是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因此要敢于追求理性的极至或者说最高理性。而最高理性无非是对最普遍规律之认识，而这类规律只可能是辩证规律。而这恰是中国文化之强项，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性所在（“辩证法”这个词来自古希腊人，但若据此说只有希腊有辩证法，这是误解，名实不分。中国不仅有辩证法，而且具有自己特殊的贡献）。因此，以著者观，扭转中国本位文化被动局面的首选突破口，当是发展中国的辩证法。——